

從兒童繪畫表現， 探討文化的差異與特質

——臺北市小學五年級的小朋友如何畫「我未來的家庭」

陳瓊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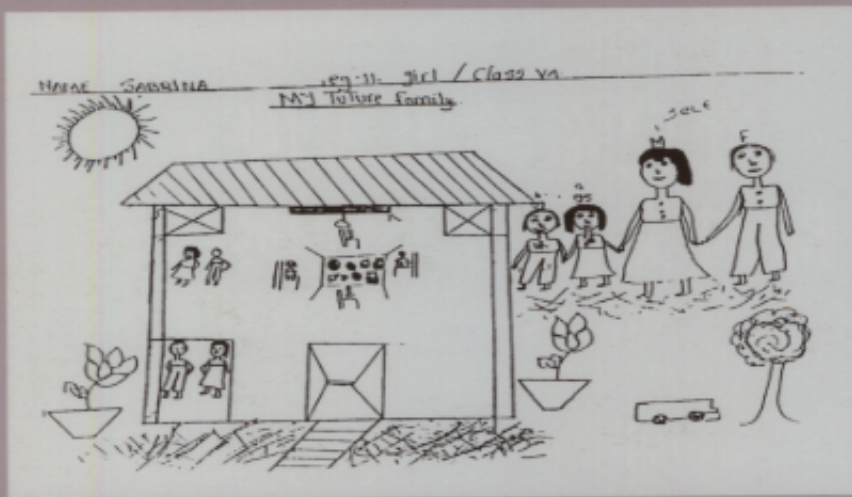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副教授
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美術教育博士

研究背景與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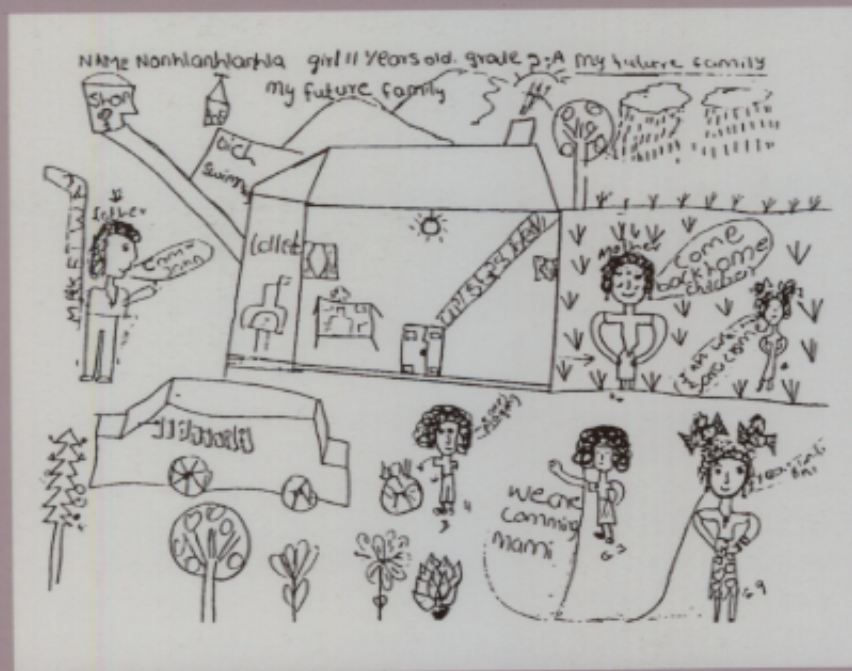
安德森(Andersson, 1995)從社會文化的觀點，探討兒童畫中所反映出地區習俗的特性。他比較三個不同文化背景的二三二位小學五年級的兒童作品，其中包括一一四位的坦尚尼亞(Tanzania)兒童，四八位非洲國協所屬難民所(a refugee settlement of the Africa National Congress)的兒童，以及七十位的瑞典(Sweden)兒童，畫題是「未來的家庭」，兒童被要求畫他未來的家庭在其未來的家之前(to draw their future family in front of their future home)，研究結果指出，兩處非洲(坦尚尼亞與難民所)的兒童，以非再現的方式，運用同樣特殊的地區習俗之手法來捕捉房子的特色——將窗戶畫在房子的邊角位置(如圖一、二)。此種表現的方式，卻很少出現在瑞典兒童所畫的作品中(如圖三)。兒童作畫時，努力於圖像式的真實(iconic

realism)以及形式上的相等性(Andersson, 1995, pp. 101-112)。

這種對於地區性習俗(Local Convention)的關注，是立基於多元文化特質的考量，源於帕傑(Paget, 1932)的研究。皮氏指出在非洲西南的Windhock地區，兒童畫雙三角形的形式表示人的身軀(如圖四)。此後，不少學者亦從事此一方向的研究(Aronsson & Junge, 1994; Court, 1989; Golomb, 1992; Lindstrom, 1994; Midbjer, 1992; Wilson & Wilson, 1982, 1984, 1985)。有關兒童「將窗戶畫在房子的邊角位置(corner position)」，在尼泊爾(Nepal, Lindstrom, 1994)，肯亞(Kenya, Court, 一九八九)，衣索匹亞(Ethiopia, Aronsson & Junge, 1994)，以及那米比爾(Namibia, 非洲西南, Midbjer, 1992)等地均有所發現(如圖五)。一九八九年，



圖一 邊角位置的窗戶，十一歲坦尚尼亞女孩畫作（取自 Andersson, 1995, p.1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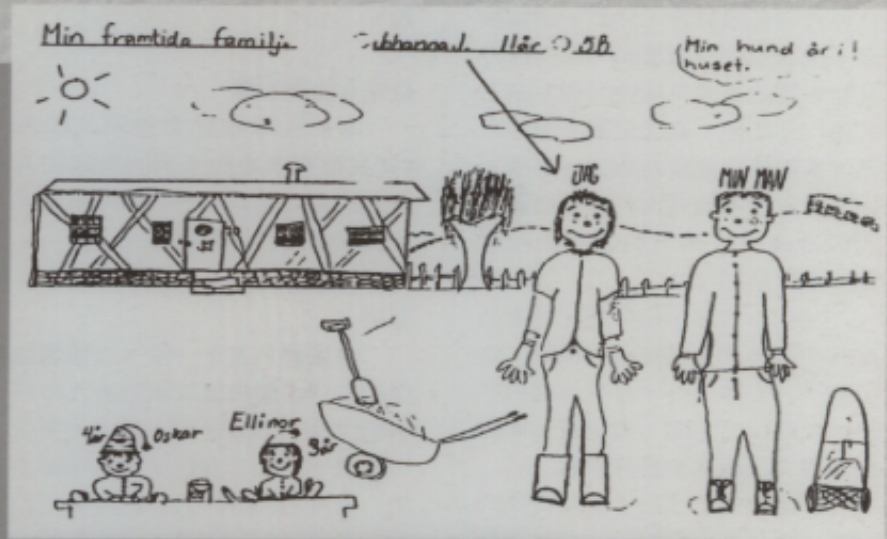


圖二 邊角位置的窗戶，十一歲南非難民所女孩畫作（取自 Andersson, 1995, p.107）

安德森比較七至十一歲的非洲與瑞典兒童的畫作「我到學校的路」，進一步發現這種「將窗戶畫在房子的邊角位置」是非洲兒童表現的特徵，但並非為瑞典兒童所共有（Andersson, 1989）。

社會文化的因素，或隱或顯影響藝術表現的樣式。許多研究者已證明在兒童美術的發展過程中，愈在早期，其繪畫表現的形式愈具普遍性，當兒童愈趨成長，其繪畫的樣式則較具有文化上的差異。譬如，溫娜（Winner, 1982）提出從九或十歲起，兒童畫畫時，傾向於混入其文化的習俗。貝雷費（Berefelt, 1987）也指出十至十一歲的兒童極受其所處文化的影響，無論是動機、象徵，或者是畫畫的策略、形式，他們都非常依賴其地區性繪畫的傳統（Andersson, 1995, p.105）。寇格（Cox, 1992）則發現幼小兒童的人物畫，不論地區，有較大的相似性；較大兒童的人物畫則有較大的差異性（Cox, 1992, p.69）。因此，若想從畫作中去瞭解文化因素的影響，小學五年級（約十歲左右）的學童似乎是可以進行研究的一個切入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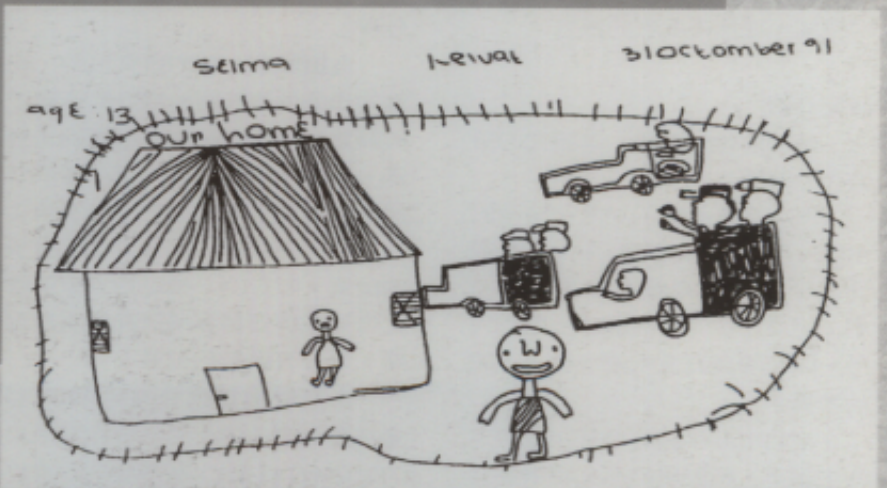
安德森以觀察兒童畫作中，「窗子的位置」作為瞭解地區性習俗影響繪畫表現形式的關鍵。依其解釋，非洲孩子將窗畫在邊角與其傳統文化中房子的設計有關，其窗子從某一角度看，似乎即在牆的邊圍，所以，即使現在的房子已有了改變，可是當兒童作畫時仍受到地區特色的影響，而為此種特殊的圖繪樣式。相對的，瑞典的兒童因受現代媒體資訊的影響，絕大多數將窗子安置在房子的中間或旁邊，一種通俗能解的表現樣式（Andersson, 1995, p.110）。從此研究，我們可以發現，「窗子的安排」是透露文



圖三
中心位置的窗戶，十一歲瑞典女孩畫作
(取自 Andersson, 1995, p.108)



圖四
三角形式的範例
(取自 Paget, 1932, p.143)



圖五
邊角位置的窗戶，十三歲那米比爾女孩畫作
(取自 Midbjer, 1992, p.16)

化特質的有效線索，然而，這種線索，是否也能用來檢視，深受西方文化影響的臺灣兒童在同樣主題下的畫作？如果，臺北兒童所處的大環境與瑞典兒童較為類似，那麼，他們的畫作應與瑞典的兒童接近，而較不同於非洲小朋友的表現樣式，事實是如何？

在另一方面，如果臺北兒童的畫作與瑞典的兒童接近，那麼，除了窗子的安排之外，會有何種的訊息可以藉由此主題，透過畫面來瞭解臺灣文化環境的特殊影響？

安德森的研究給予學童特殊的命題，而且有所限制——兒童被要求畫他未來的家庭在其未來的家之前，這項限制預期研究對象在畫作中，能表現出「人」與「房子」，從「房子」的表現來觀察研究「窗子」，但從其所收集的資料中，有二三位坦尚尼亞的兒童，十五位非洲國協所屬難民所的兒童，以及十六位瑞典的兒童並未畫有窗子。由此看來，命題實施時的限制，並不絕對影響兒童安排窗子的樣式。倘若把此限制消除，僅要求學童畫「我未來的家庭」，他們可能畫有房子、或家人、或房子與家人等，如此，應該同樣可以獲得有關於窗子的安排方式，同時，可能給予兒童較為寬廣的表現空間，而獲得其它的訊息。

研究目的

基於前述的問題，本研究的目的在於瞭解：

一、臺北市五年級的兒童在特定的主題—「我未來的家庭」中，所表現的窗子安排樣式與安德森的研究中，坦尚尼亞、非洲國協所屬難民所、以及瑞典兒童所表現樣式之間的差異。

二、臺北市五年級的兒童在此特定的主題下，所表現的形式特徵與意

義。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除畫題實施時的限制（兒童被要求畫他未來的家庭在其未來的家之前）取消外，餘皆摹擬安德森的研究方法與模式。

對象

學童總共五十一位，以集體抽樣的方式，隨機選取兩班臺北市古亭國小五年級的學生。其中，男生二六位，女生二五位。平均年齡十歲八個月（安德森的研究，坦尚尼亞的兒童總共一一四位，平均年齡十歲十一個月；難民所的兒童總共四八位，平均年齡十一歲五個月；以及瑞典的兒童總共七十位，平均年齡十歲十個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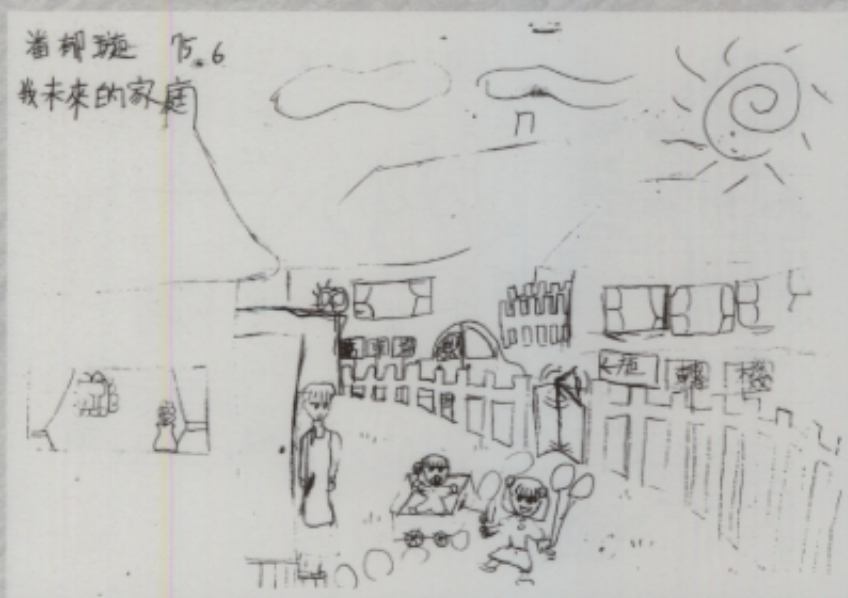
實施過程

資料的收集，由研究者親自操作。學童使用 21 公分×29.7 公分，相等於 A 4 大小的橫式紙張、鉛筆和橡皮擦，在平常的一節課四十分鐘內，運用其想像力畫「我未來的家庭」（較安德森的研究，作畫時間少五分鐘）。作品收集於民國八十六年一月廿七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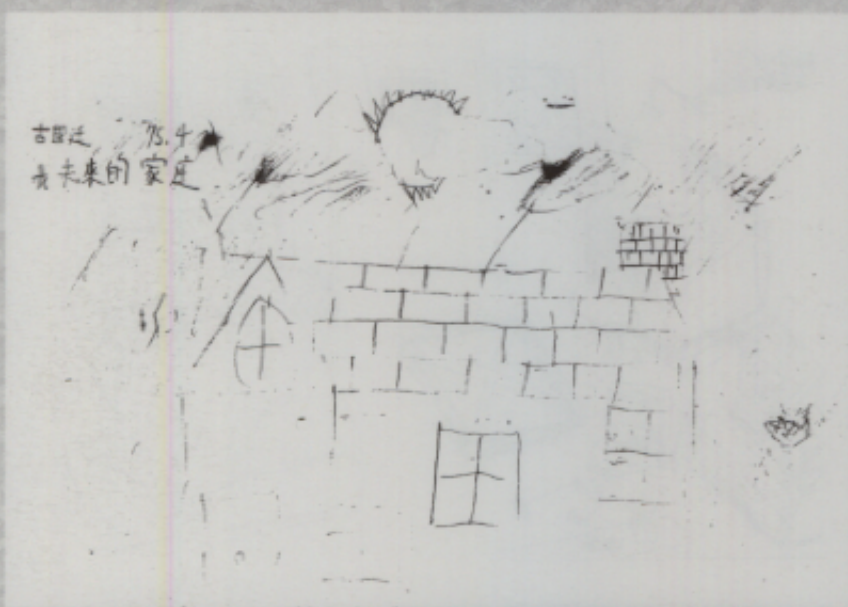
分析

為瞭解第一項的研究目的，學童的作品依據其對於窗戶的安置予與歸類。每幅作品依兩項類別來登錄。一為角落的位置：有一個或二個以上的窗子鄰接於房子的邊角；一為中心的位置：相對於實際房子的位置。卡方 (X^2) 檢定用來瞭解臺北市兒童與安德森所研究的組群之間，是否有顯著的差異。

由於取消畫題實施的限制（兒童被要求畫他未來的家庭在其未來的家之前），因此，在所收集的畫作



圖六 邊角位置的窗戶，十歲九個月臺北市男孩畫作



圖七 中心位置的窗戶，十歲七個月臺北市女孩畫作

中，僅抽取兒童畫有「他未來的家庭在其未來的家之前」，亦即窗子係從房子的外觀來安排的畫作，來作為與安德森研究比較之資料來源。

為瞭解第二項的研究目的，在大體檢視過所有作品後，將學童的作品依據形式上的共通性予以歸類與分析。每幅作品依「作畫的觀點」與「文字與畫的關係」予以類分。就「作畫的觀點」之類別，每件作品分別登錄於：一、屋內的觀點：似從站在屋內，來描繪情景；二、透視的觀點(X光畫)：所描繪的情景，似從屋外或牆外而可以透視到其屋內；三、屋外的觀點：描繪屋外的情景；四、其他：不屬於以上三者。就「文字與畫的關係」之類別，每件作品分別登錄於：一、有文字之補述：畫面中有文字補充說明情節、人物的動作或物件之標示等；二、無文字之補述。次數百分比的分配，用來描述形式的特徵與傾向。

研究結果

一、臺北市五年級的兒童在特定的主題—「我未來的家庭」中，所表現的窗子安排樣式與安德森的研究中，坦尚尼亞、非洲國協所屬難民所、以及瑞典兒童所表現樣式之間的差異，詳如附表一。在臺北市地區所取樣，合於比較條件的十六件作品中，僅有二件作品將窗子安於邊角的位置(如圖六)，其餘則置於中心(如圖七)。

依據卡方檢定分析，臺北地區與坦尚尼亞兒童所表現樣式之間具有顯著的差異($X^2=13.18, P<0.001$)；臺北地區與非洲國協所屬難民所兒童所表現樣式之間具有顯著的差異($X^2=6.00, P<0.05$)；臺北地區與瑞典兒童所表現樣式之間並無顯著的差異($X^2=1.77, P>0.$

05)。臺北地區兒童畫窗子時傾向於將窗子畫在房子的中心或旁邊，而較少畫於角落的位置。

二、臺北市五年級的兒童在此特定的主題下，所表現的形式特徵，依作畫的觀點分析如附表二。從表二我們可以發現，五十一位中有二十三位的多數學童，表現其未來的家庭時，係從屋內的觀點來描繪其家庭中的景物，生活細節的情形，如用餐，玩遊戲等(如圖八、九)。有十三位的學童採X光畫的方法，除包括房子的外圍，往內則可以透視到屋內的情景(如圖十)。有十四位學童純以屋外的角度來描繪其住家的環境，或住家的環境與家人等某些活動的進行等(如圖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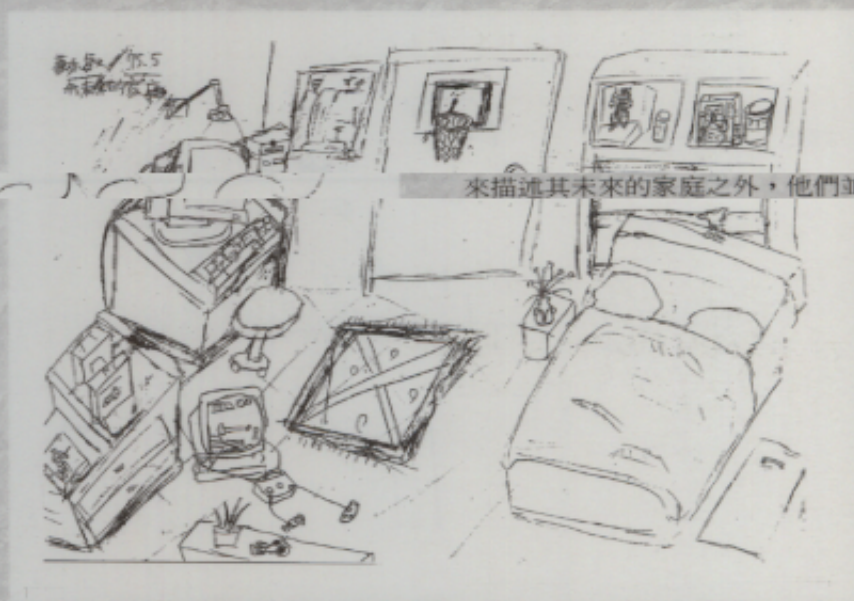
除作畫觀點上的差異外，作品形式上的另一項特徵為「文字的補述」。從表三，在五十一位的學童中有三十二位，運用文字來補助畫面涵意，說明活動的進行(如圖十二)。

討論

為何有如此多數的學童，畫其未來的家庭時是侷限於屋內？這是一項有趣的問題。在談論成人藝術創作時，我們常說，藝術創作可能來自於藝術家日常生活的經驗(陳瓊花，1995，pp.56-71)。這種說法，應同樣適用於兒童的畫作。目前調查的作品所呈現出來的特徵，或可說是生活於臺北市兒童日常家居生活的縮影。兒童對於未來的家庭意象，來自於目前的家庭概念。對多數的兒童而言，大廈或公寓裏日常生活的點滴，即代表了家庭整體或大部的印象。大廈或公寓裏所分配到的空間，才真正是屬於自家的活動場所。大廈或公寓的外觀或許因為是與他人分享，在形成其未來家庭的概念中，便顯得不是那麼



圖八 屋內的觀點，十一歲三個月臺北市女孩畫作



圖九 屋內的觀點，十歲六個月臺北市男孩畫作

來描述其未來的家庭之外，他們並

附表一：兒童畫房子時窗子的安排(百分比)

位置類型	國別	坦尚尼亞 (n=91)	非洲國協所屬難民所 (n=33)	瑞典 (n=54)	台北 (n=16)
邊角位置(%)		62	48	03	12
中心位置(%)		38	52	97	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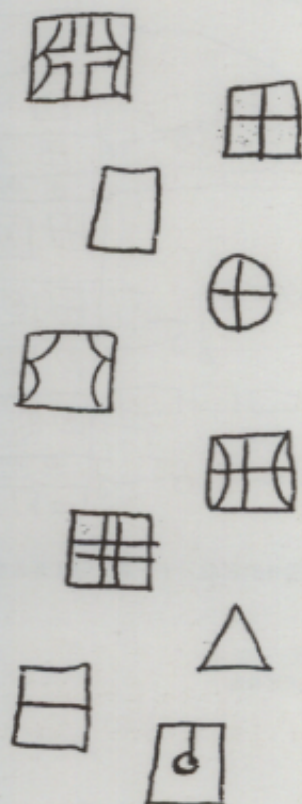
註：畫作中沒有畫窗子：坦尚尼亞 23、難民所 15、瑞典 16(Amdersson, 1995, p.108)、臺北 7(總計畫作 51，其中共有 23 畫作合於畫有「他未來的家庭在其未來的家之前」的命題限制)。這些作品並沒有包括在此類分析。

附表二：「我未來的家庭」作畫的觀點(次數·百分比，n=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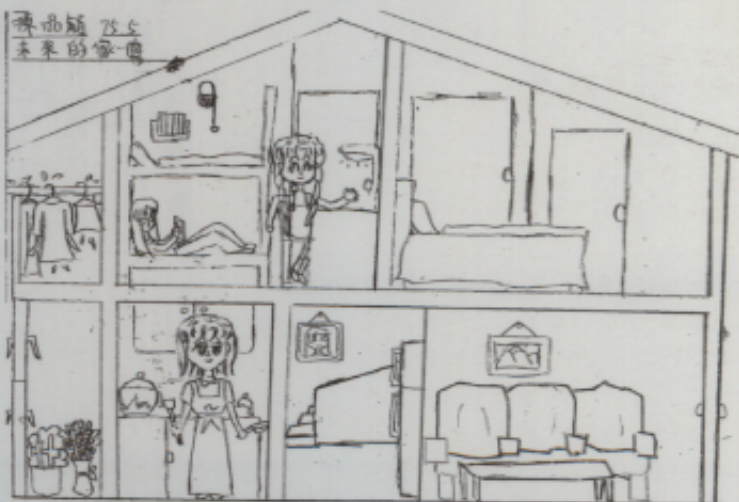
性別	類別	屋內的觀點	透視的觀點	屋外的觀點	其他	合計
男(%)		12(23.5)	7(13.7)	7(13.7)	0	51.0
女(%)		11(21.6)	6(11.8)	7(13.7)	1(2)	49.0
合計		23(45.5)	13(25.5)	14(27.5)	1(2.0)	100.0

附表三：「我未來的家庭」文字與畫面的關係(次數·百分比，n=51)

性別	類別	有文字補述	無文字補述
男(%)		16(31.3)	10(19.6)
女(%)		16(31.3)	9(17.7)
合計		32(62.7)	19(3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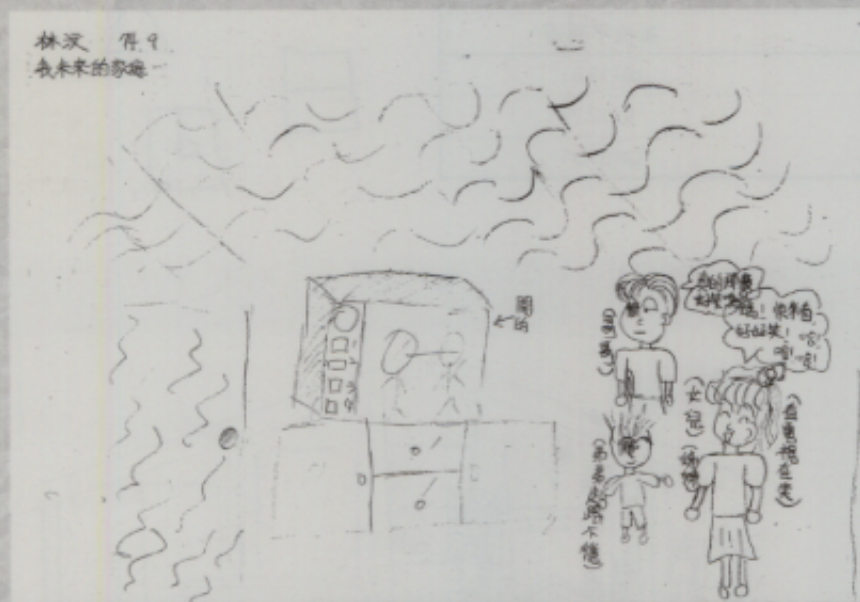


圖十 透視的觀點，十歲六個月臺北市女孩畫作





圖二 屋外的觀點，十一歲三個月臺北市男孩畫作



圖三 文字補述畫面，十一歲四個月臺北市女孩畫作

的重要。因此，多數的兒童採取站在屋內某一角的方式來描述此一主題。





一般臺北市兒童除學校之外，安親班的課輔班或家裡的各項玩樂用具，便是其主要的課後休閒活動，有五位兒童將此內容表現於畫面中(如圖十三)。此外，有六位兒童的作品，尚且表現出科技的影響，譬如，機器手擺動搖籃，機器僕人，打掃的機器人等等(如圖十四)。

兒童繪畫意象的形成與發展，是一複雜而多元面向的過程，受到社會文化的影響(Vygotsky, 1978)。誠如金勒與達拉斯(Kindler & Darras, 1994)的研究結果所指：幼年兒童繪畫的意象，是由多元媒介所組成，其中行動、物體、人物的構成，往往同時運用繪畫、語言、和表情的元素(Kindler & Darras, 1994, p.11)。在本研究中，我們發現多數的學童除以圖繪來描述其未來的家庭之外，他們並且使用文字語言來明顯或強化其所欲表現的內容。這種情形固然一方面顯示出兒童意圖別人對其作品有所瞭解的社會交流傾向，在另一方面而言，是否也呈顯出兒童繪畫性表現語彙的不足，或對於繪畫自主性瞭解的缺乏。此一年齡層的兒童屆臨理智萌芽，在繪畫表現時講求視覺上的寫實(Lowenfeld, 1957; Cox, 1992, p.107)。在資料收集的過程中，筆者觀察到許多學童對自己所畫的不滿意，而想予以修改，所以頻繁的使用橡皮擦，此舉措正顯示出寫實要求的傾向。當繪畫表現的能力無法充份滿足其寫實再現的意圖時，文字語言似乎成了最佳輔助的媒介。這種以文字輔助畫面的表現形式，是否受到市面上充斥的漫畫表現樣式的影響，則有待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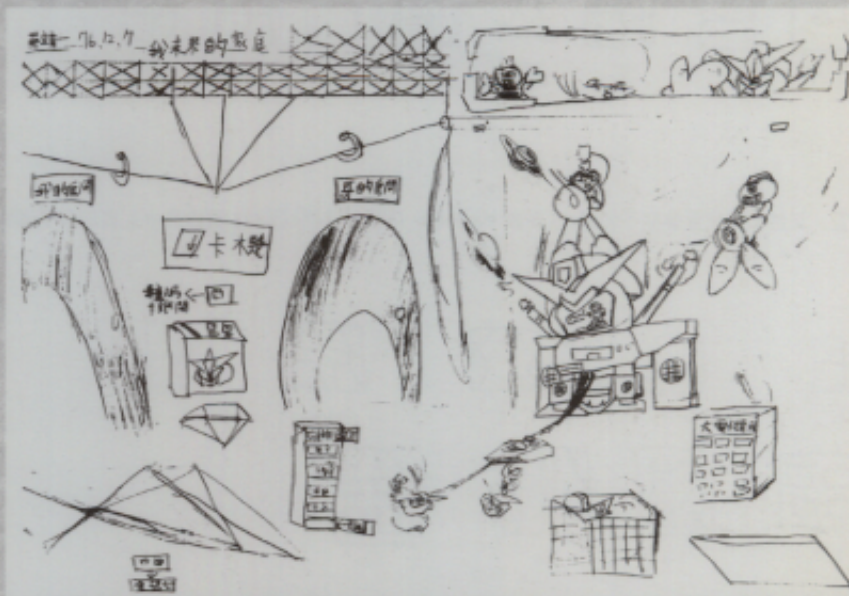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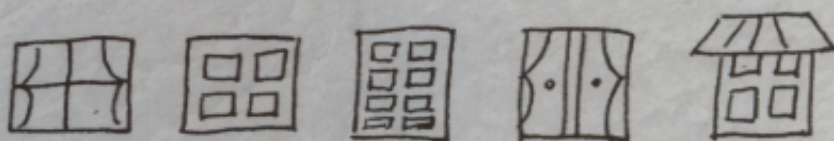
一步的瞭解。從美術教育的立場，美術課程應提供充足的機會與適當的引導，讓學生主動去探索、發覺、與嘗試各種不同繪畫表現的媒材與形式，以培養其審美的知覺與表現的能力。

畫面某一形式上的特徵，可能源自於地區習俗的特性——對於某一類物象象徵符號的運用，亦即有關於文化的傳統。就目前的研究看來，將窗子安排於邊角的位置是非洲地區兒童表現上的特徵，相對的，將窗子安排於中心的位置是我臺北與瑞典地區兒童表現上的特質。如果，「窗子安排於邊角的位置」是非洲地區文化傳統的徵象，那麼，「將窗子安排於中心的位置」，是否可以解釋為現代文化影響下，兒童在畫房子時所表現出普遍性的特色？為何臺灣傳統四合院式或廟宇建築的樣式，沒有出現在畫作中？是否可能出現在鄉下地區孩子的作品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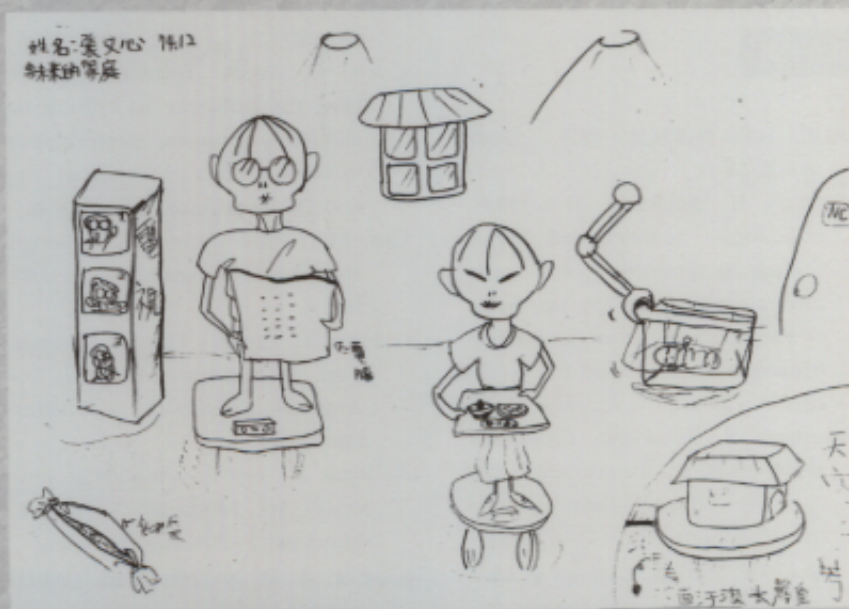
此外，凱洛格(Kellogg, 1969)在其研究中指出，五至七歲兒童畫窗子的形式如圖十五：

其中，的樣式出現率最高，其次為 (Kellogg, 1969, p. 126)。目前所有畫窗子的畫作二十四張作品的窗子表現樣式中(如圖十六)，與的出現率分別為30.7%，26.9%，與凱洛格所提的二種主要表現樣式相近。然而，這兩種主要表現窗子的樣式，是否普遍延續至七歲以後？並且，只適用於想像性主題的繪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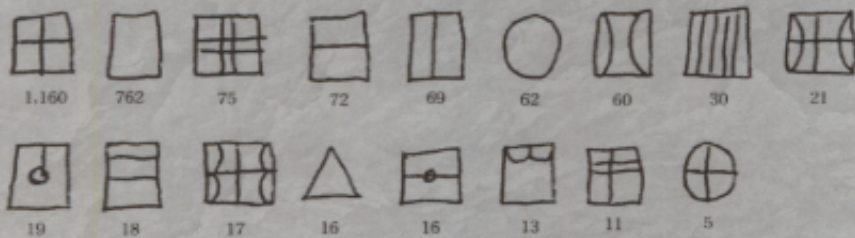
以上所提之各項問題，誠有待於未來之研究與探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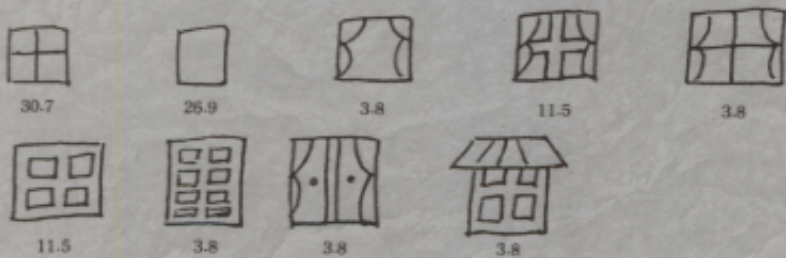
圖五 各式電玩，十歲臺北市男孩畫作



圖六 科技影響，十一歲一個月臺北市女孩畫作



圖五 五至七歲兒童畫窗子的樣式(取自 Kellogg, 1969, p.126) (2,426 幅作品中主要的窗子圖樣)



圖六 臺北市小學五年級兒童畫窗子的樣式(%)

參考文獻

陳瓊花 (1995). 藝術概論。臺北：三民書局。頁 56-71。

Aronsson, K. & Junge, B. (1994). Intellectual realism and social scaling in children's art: some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the basis of Ethiopian children's drawings. Manuscript submitted for publication.

Andersson, S. B. (1989). Children's representations of everyday life: A cross-cultural study. Unpublished manuscript, Department of Child Studies, Linköping University, Linköping, Sweden.

Andersson, S. B. (1995). Local conventions in children's drawings: a comparative study in three cultures. *The Journal of Multicultural and Cross-cultural*,

13, 101-112.

Court, E. (1989). Drawing on culture: the influence of culture on children's drawing performance in rural Kenya. *Journal of Art and Design Education*, 8, 65-88.

Cox, M. (1992). *Children's drawings*. New York: Penguin Books USA Inc.

Golomb, C. (1992). *The child's creation of the pictorial worl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Kellogg, R. (1969). *Analyzing children's art*. Mountain View, Ca.: Mayfield Publishing Company.

Kindler, A. M. & Darras, B. (1994). Artistic development in context: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pictorial imagery in the early childhood years. *Visual Arts Research*, 20(2) • 1-13.

Lindstrom, L. (1994). Nepal—Barns

bilder(Nepal—Children's drawings) *Bild i skolan*, 2, 24-29.

Lowenfeld, V. (1957). *Creative and mental growth*. New York: Macmillan.

Midbjer, A. (1992). *Art—the challenge to integrate, using an investigative method: an art education study in five primary schools in Owamland, Namibia*. Umea: University of Umea, Sweden.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Paget, G. W. (1932). Some drawings of men and women made by children of certain non-European races.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62, 127-144.

ygotsky, L. S. (1978). *Mind in societ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ilson, B. & Wilson, M. (1982). The case of the disappearing two-eyed profile: or how little children influence the drawing of little children. *Review of Research in Visual Arts Education*, 15, 19-32.

Wilson, B. & Wilson, M. (1984). Children's drawings in Egypt: cultural style acquisition as graphic development. *Visual Arts Research*, 10(1) • 13-26.

Wilson, B. & Wilson, M. (1985). The artistic tower of Babel: inextricable links between culture and drawing development. *Visual Arts Research*, 11, 90-104.

Winner, E. (1982). *Invented worlds: The psychology of art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